

广东外贸越千年

广东外贸一千年 互利共赢向未来

文/羊城晚报记者 周欣怡 何文涛 通讯员 粤博宣 图/羊城晚报记者 邓鼎园



北宋湖州窑周明造佛像



清康熙款珐琅彩花蝶纹碗



“广东外贸一千年”大展现场

2025年10月15日,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主办、广东省博物馆(广州鲁迅纪念馆)承办的“互利天下:广东外贸一千年”展览在广东省博物馆正式展出,展期持续至2026年10月15日。

展览甄选来自广东省博物馆及全国收藏机构超200件(套)珍品,堪称一次外贸相关主题的“国宝集结”。展览以广东千年外贸发展脉络为主线,通过文物实证与制度演进的双重叙事,全方位展现广东在中国对外贸易史上的独特地位与深远影响。

千百年来,广东因海而兴、向海而行,在中国与世界交往的长卷中留下恒久印记。从市舶初兴到法令渐备,从朝贡体制推行到“一口通商”实施,从新中国创办广交会到新时代推进自贸试验区建设,广东始终挺立在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

展览与第138届广交会同期开幕,彰显中国在风云激荡中保持开放定力的坚强意志,以历史经验回应新时代对外开放的现实命题。

广东千年外贸的繁荣,离不开制度上的探索与实践。展览以“互利天下”为主题,分为“市舶利邦”“商舶云集”“中西交汇”和“潮涌新章”四大篇章,完整呈现广东外贸从制度萌芽到全球枢纽的演进历程。

“市舶利邦”聚焦唐宋时期广东在朝贡贸易与商舶转型中的突破,如“广中事例”推行、广州—澳门贸易结构形成,呈现制度弹性与市场活力。

“中西交汇”再现清代广东作为中

易的市舶制度开始出现。这一制度起初主要在广州施行,到了宋元时期,便逐步推广至东南沿海的各个港口。宋代推行的《广州市舶条》更成为全国性的贸易法規。

“商舶云集”部分展现明代广东在朝贡贸易与商舶转型中的突破,如“广中事例”推行、广州—澳门贸易结构形成,呈现制度弹性与市场活力。

“中西交汇”再现清代广东作为中

西贸易与文化交融的核心舞台,以“一口通商”、粤海关体制、十三行贸易为焦点,外销艺术品尽显文明互鉴,中外科技文化深度交融,彰显出“开放”与“互鉴”的共生。

“潮涌新章”讲述新中国成立以来广东外贸的延续与飞跃,从广交会的创办到自贸试验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彰显广东在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中的前沿担当。

海路纵横因和而通、互利而兴

展览汇聚众多重磅文物,如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唐牙雕人像、元青花人物图玉壶春瓶、梁庄王墓出土的金明锦、清乾隆农耕商贸图外销壁纸等,还结合文献、图表、场景复原与多媒体互动,生动还原贸易场景。

在展陈设计上,展览注重沉浸式体验与学术深度的融合,对唐代市舶使设立、宋元市舶法规、明中期“广中事例”、清“一口通商”、新中国广交会创立及新时代自贸区建设等关键节点,通过大字体、突出色彩与时间轴进行强化呈现,助力观众直观、准确地把握外贸制度的演变脉络。展览还配备触摸互动屏,以动画形式解读广东外贸历史,增强观展

的趣味性与参与感。

广东省博物馆科研部副主任、展览执行策展人丁蕾向记者介绍,此次展出的一件元代青花人物图玉壶春瓶是中外文化、贸易交流的重要见证。“我们在广东城市中心以及沿海的沉船上都曾发现过许多青花瓷器碎片。元青花所使用的钴料,当时大多都来自海外进口。此外玉壶春瓶的器形也是重要的外销器形,在元明时期的海外沉船中屡有发现,如韩国新安沉船出水的龙泉窑玉壶春瓶,以及有记录的最早到达欧洲的中国瓷器丰山瓶等。”

丁蕾表示,像这类外销品的出现,以及唐宋元以来对外贸易的爆发式增

长,其背后都有国家制度作为支撑。“这些制度,正是以平等互利为指导思想,为古代海上贸易的繁荣提供了坚实保障。”

广东的海外贸易史,是中华文明对外交流的生动缩影,也是中华文明和平性的深刻注解。海路纵横,因和而通,凭互利而兴,每一次扬帆远航都是友谊的远征,每一次往来互市都是共赢的契机。

通过展览,人们从一件件文物中回望历史,于千年商路中感悟智慧,在文明交汇处重启对话,共同见证一个更加开放、自信、共融的广东,驶向时代更深处的蔚蓝之海。

【专家访谈】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主任安东强:历史选择了广东

安东强:第一个关键节点是宋代,特别是北宋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颁布的《广州市舶条》。《广州市舶条》被认为是中国目前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成文海贸法,后来推广到全国各市舶司。这标志着国家层面的海上贸易管理制度开始系统化、法典化,奠定了后世制度的雏形。

第二个关键节点是明代。明代中期,广东率先推行“广中事例”,允许葡萄牙人租居澳门、允许百姓与外商直接贸易,展现出地方在中央管制下探索弹性空间的智慧。当时,在朝贡贸易体制下,广东地方为了应对财政压力、满足各方利益,进行了一系列制度突破和政策调整,实现了朝廷、地方和民间商人的“三方共赢”。

第三个关键节点是清代乾隆时期的“一口通商”政策。这并非传统认为的“闭关锁国”,而是清政府对西洋贸易管理方式的调整。对应东印度公司印度及亚洲其他地区采取的贸易垄断,清政府则同样将对外贸易的管理集中于粤海关,广东形成以广州为核心的、粤海关监管的十三行垄断体制为基础的外贸体系。它深刻影响了此后近百年的中西贸易格局,也是理解近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一个重要窗口。

第四个关键节点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广交会。新中国成立后,广东凭借地缘优势与侨资基础,继续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扮演关键角色,奠定了当代广东

外贸繁荣的历史基础。1957年广交会应运而生,成为新中国打开国门、对抗封锁的重要平台。

广交会的创立为国家开辟了“以贸破局”的路径。广交会既是国家经济外交的风向标,也是一部浓缩的中国改革发展史,并持续在新时代焕发出强劲生命力。

和平包容的文明基因

羊城晚报:广东外贸制度始终走在全国前列,为什么在中国对外贸易史上广东能始终“在场”并处在核心关键的位置?

安东强:首先是地理与气候优势。广州及周边地区拥有优良的天然港湾,在古代帆船贸易时代,这里就是理想的停泊和补给点。其次,纵观全球贸易航线的演变,无论是古代的近海航行,还是大航海时代以后从欧洲经印度洋、穿越马六甲海峡而来的主航线,广州都是进入中国沿海的首选或重要枢纽之一。这种区位优势使其长期处于全球贸易网络的关键节点上。

羊城晚报:在国家对外贸易制度建设乃至全球贸易中,千年来的广东外贸起到了怎样的历史作用和独特贡献?

安东强:从整个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之间的交流往来来看,广东一直处在枢纽、关键位置。某种程度上讲,广东承担了为整个中华文明“呼吸”的功能。广东所处的南海地区是整个海洋世界

中非常重要的枢纽地区,可以说是东西方海上交往的“十字路口”。广东不仅是商品、技术与文化交流的平台窗口,更是催生与输出新经济模式、商贸制度与思想观念的历史中心。

“广东非徒重于世界,抑且重于国中矣。”梁启超在《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中也明确指出,广东的重要地位兼具世界性与全国性。

羊城晚报:在广东外贸制度演变中,有哪些特质是一脉相承的?

安东强:和平与包容,始终是广东乃至全国外贸制度史中不变的基因。中国的对外贸易,特别是广东的实践,其主要驱动力一直是经济和商业利益,而非领土扩张或殖民掠夺。

广东外贸史也体现出很强的包容性。从唐宋时期开始在广州设置“蕃坊”,允许外国商人聚居并由其“蕃长”进行管理,到明代允许葡萄牙人租居澳门,再到清代在十三行区域设立商馆供外商居住和贸易,都允许不同文化、宗教、地域的人群在一定的秩序下共生共荣。直到今天,广东这种历史特质依然可知可触碰。

所以说,除了优越的地理位置,广东经过千年演变所营造出的可信赖的交易环境和高效的商业制度,决定了为什么是广东而非其他沿海地区,能如此持久地成为中外商人共同认可的贸易枢纽。可以说,是历史选择了广东。

羊城晚报记者 何文涛 朱绍杰 周欣怡

【思政实践】

通过让文物和史料“说话”
创新思政教育

10月15日重磅亮相的“互利天下:广东外贸一千年”专题展,串联起广东从唐宋到新时代的外贸发展脉络。

据悉,广东省博物馆还将配套推出“校园巡展”“文物讲师进校园”等活动。未来,这场跨越千年的展览,将持续为大中小学思政教育注入“开放”“创新”“共赢”的力量,让青年一代从广东外贸的千年故事中,读懂中国的过去、把握当下的机遇、坚定未来的方向。

“这场跨越千年的展览,既是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的鲜活样板,更为思政课教学提供角度精准、细节丰富、内容扎实的素材。”广州职业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直属党支部书记曹群强调,此次展览为大中小学不同学段学生搭建起感知家国情怀、涵养开放视野、树立文化自信的独特平台。

广东实验中学云城校区副校长石晓芸表示:“这不仅是一次文物展示,更是一次思政教育的创新实践。”

羊城晚报记者 何宁

【系列讲座】

聆听广东外贸制度演变的
千年史话

10月15日,在“互利天下:广东外贸一千年”展览正式开幕之际,同主题系列讲座在广东省博物馆同期举行。该系列讲座由广东省委宣传部主办,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广东省博物馆(广州鲁迅纪念馆)联合承办。

系列讲座共设10期,持续时间为2025年10月至12月、2026年3月至9月,每个月开展一场,以文物为证、以制度为线,深入挖掘广东外贸从唐宋市舶制度到近现代广交会的千年历史内涵,阐释其作为东西方文明交流枢纽的历史价值与当代启示。同时,探讨广东外贸坚持的和平友好、互利共赢、开放合作传统的形成与传承,以及在全球化背景下广东外贸的新机遇与新使命。

羊城晚报记者 何文涛

通讯员 广东社科宣

【专项征集】

一起构建广东外贸历史的
集体记忆

展览海报中的元青花人物图玉壶春瓶十分亮眼

为系统呈现广东在千年外贸历史中的卓越贡献,15日,广东省博物馆(广州鲁迅纪念馆)发布征集公告,面向社会公开征集与广东外贸历史相关的各类文物与资料。

征集重点有二:一是广东外贸史脉络核心物证。聚焦广东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枢纽及外贸门户的历史演进轨迹,重点征集海上丝绸之路与海洋贸易史物证、外贸制度与政策演变物证、展会物证、博览会物证、商帮群体与实业家见证物、清代外销艺术珍品;二是外贸驱动下的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物证。突出广东在外贸变革浪潮中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经济强省转型的演进历程,重点征集产业转型历程物证、改革开放关键节点物证、当代外贸发展见证物。

博物馆对征集物提出了若干要求:须为历史原物(暂不接受复制品),来源清晰可靠,无伪造、篡改或仿造嫌疑;须来源合法(如合法交易、继承、受赠等),权属清晰,无任何纠纷或法律争议;能典型反映广东外贸某一历史阶段、关键领域或重大事件的突出特征;属本馆馆藏体系中的稀缺品类或重要缺项;实物应保存状态良好,结构完整,无明显残缺、破损或病害等,具备展陈和研究条件;文献资料应内容连贯、信息完整、字迹清晰,具有较高的历史研究与文化承载价值。

该征集专项自公告发布之日起持续时间不少于一年,并长期接受社会捐赠线索申报。如有意提供藏品线索或进行具体沟通,可通过cpzj@gdmuseum.com邮箱联系。

羊城晚报记者 何文涛 通讯员 粤博宣

通讯员 广东社科宣



扫码咨询征集信息

10月15日,“互利天下:广东外贸一千年”大展在广东省博物馆开展。从实物贸易到制度建设,广东以文明交流为魂,尽显历史自觉与创新精神。

中山大学是此次展览支持单位之一,该校历史学系主任、教授安东强参与此次展览大纲审稿。羊城晚报记者就此专访安东强,梳理广东外贸制度千年演变的脉络,解读广东何以“广”交下的千年史话与启示——

“三方共赢”的历史智慧

羊城晚报:与其他展览不同,此次“互利天下:广东外贸一千年”专题展特别强调“制度”这条历史脉络。您认为观众应该如何“读懂”这次展览?

安东强:这次展览最大的亮点就在于,它试图去揭示和解读文物背后广东对外贸易制度的一千年演变脉络。展览所提的“一千年”,并不是虚指,而是有明确依据的。

广东的外贸活动早在秦汉时期就已存在,但真正形成一套相对完整、由国家主导或深度介入的管理制度,并产生深远影响,应从唐宋时期开始算起,距今超过一千年。其实国内外外贸制度史的研究已经非常充分,我们也想通过展览把学术成果传递给普罗大众。

羊城晚报:有哪些关键的“制度节点”从根本上塑造了广东的外贸格局?

安东强:第一个关键节点是宋代,特别是北宋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颁布的《广州市舶条》。《广州市舶条》被认为是中国目前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成文海贸法,后来推广到全国各市舶司。这标志着国家层面的海上贸易管理制度开始系统化、法典化,奠定了后世制度的雏形。

第二个关键节点是明代。明代中期,广东率先推行“广中事例”,允许葡萄牙人租居澳门、允许百姓与外商直接贸易,展现出地方在中央管制下探索弹性空间的智慧。当时,在朝贡贸易体制下,广东地方为了应对财政压力、满足各方利益,进行了一系列制度突破和政策调整,实现了朝廷、地方和民间商人的“三方共赢”。

第三个关键节点是清代乾隆时期的“一口通商”政策。这并非传统认为的“闭关锁国”,而是清政府对西洋贸易管理方式的调整。对应东印度公司印度及亚洲其他地区采取的贸易垄断,清政府则同样将对外贸易的管理集中于粤海关,广东形成以广州为核心的、粤海关监管的十三行垄断体制为基础的外贸体系。

第四个关键节点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广交会。新中国成立后,广东凭借地缘优势与侨资基础,继续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扮演关键角色,奠定了当代广东

外贸繁荣的历史基础。1957年广交会应运而生,成为新中国打开国门、对抗封锁的重要平台。

广交会的创立为国家开辟了“以贸破局”的路径。广交会既是国家经济外交的风向标,也是一部浓缩的中国改革发展史,并持续在新时代焕发出强劲生命力。

通过展览,人们从一件件文物中回望历史,于千年商路中感悟智慧,在文明交汇处重启对话,共同见证一个更加开放、自信、共融的广东,驶向时代更深处的蔚蓝之海。

羊城晚报记者 何文涛 朱绍杰 周欣怡

安东强:首先是地理与气候优势。广州及周边地区拥有优良的天然港湾,在古代帆船贸易时代,这里就是理想的停泊和补给点。其次,纵观全球贸易航线的演变,无论是古代的近海航行,还是大航海时代以后从欧洲经印度洋、穿越马六甲海峡而来的主航线,广州都是进入中国沿海的首选或重要枢纽之一。这种区位优势使其长期处于全球贸易网络的关键节点上。

羊城晚报:在国家对外贸易制度建设乃至全球贸易中,千年来的广东外贸起到了怎样的历史作用和独特贡献?

安东强:从整个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之间的交流往来来看,广东一直处在枢纽、关键位置。某种程度上讲,广东承担了为整个中华文明“呼吸”的功能。广东所处的南海地区是整个海洋世界

中非常重要的枢纽地区,可以说是东西方海上交往的“十字路口”。广东不仅是商品、技术与文化交流的平台窗口,更是催生与输出新经济模式、商贸制度与思想观念的历史中心。

“广东非徒重于世界,抑且重于国中矣。”梁启超在《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中也明确指出,广东的重要地位兼具世界性与全国性。

羊城晚报:在广东外贸制度演变中,有哪些特质是一脉相承的?

安东强:和平与包容,始终是广东乃至全国外贸制度史中不变的基因。中国的对外贸易,特别是广东的实践,其主要驱动力一直是经济和商业利益,而非领土扩张或殖民掠夺。

广东外贸史也体现出很强的包容性。从唐宋时期开始在广州设置“蕃坊”,允许外国商人聚居并由其“蕃长”进行管理,到明代允许葡萄牙人租居澳门,再到清代在十三行区域设立商馆供外商居住和贸易,都允许不同文化、宗教、地域的人群在一定的秩序下共生共荣。直到今天,广东这种历史特质依然可知可触碰。

所以说,除了优越的地理位置,广东经过千年演变所营造出的可信赖的交易环境和高效的商业制度,决定了为什么是广东而非其他沿海地区,能如此持久地成为中外商人共同认可的贸易枢纽。可以说,是历史选择了广东。

羊城晚报记者 何文涛 朱绍杰 周欣怡